

杨清荣 **主编**

儒家传统伦理 的 现代价值

▲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价值 / 杨清荣主编. —北京: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3.5

ISBN 7-5005-6505-4

. 儒... . 杨... . 儒家—伦理学—研究 . B222.0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30015号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

URL: <http://www.cfeph.com>

E-mail: cfeph@drc.gov.cn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北京海淀区阜成路甲28号 邮政编码: 100036

发行处电话: (010)88190406 财经书店电话: (010)64033436

湖北南财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电话: (027)88391589 88391585

湖北新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168毫米 32开 10.75印张 260千字

2003年5月第1版 2003年5月武汉第1次印刷

定价: 20.00元

ISBN 7-5005-6505-4/F · 5676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南财公司负责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导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伦理	1
1.1 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伦理意义	2
1.2 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命运	7
1.3 “经济中国”与“文化中国”	13
1.4 儒家传统与中国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23
1.5 儒家传统伦理现代转型的意义和可能方式	33
第二章 超越性：儒家传统伦理的基本特征	41
2.1 关于“超越”的含义	41
2.2 中国传统文化中超越理论的内容和特征	47
2.3 人的超越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64
2.4 “道德超越论”的现代意义	71
第三章 “中和位育”：儒家伦理的基本精神	75
3.1 “中和位育”的基本含义及其伦理价值	75
3.2 “中和位育”的相互制约关系及其文化生态根源	89
3.3 “中和位育”与现代发展观	95
3.4 “中和位育”与现代公民社会	104
3.5 结 语	117

第四章 “以义制利”：具有中国特色的利益观.....121

4.1 儒家义利观解读.....121

4.2 “以义制利”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的意义.....138

4.3 “以义制利”与集体主义.....151

4.4 儒商：“以义制利”的积极践履者.....162

第五章 忠恕之道：现代人的自我实现方式.....171

5.1 忠恕之道及其现代解读.....171

5.2 忠恕之道与敬业精神.....187

5.3 忠恕之道与理性经济人.....199

5.4 忠恕之道与现代公民的行为方式.....206

第六章 诚信：现代人基本的精神品质.....219

6.1 “诚”与“信”的形而上意义.....219

6.2 “诚”与“信”的关系及诚信品质的锤炼.....228

6.3 诚信：作为交易行为规范的历史追溯.....232

6.4 传统诚信的文化比较及其现代转型.....236

6.5 市场经济呼唤现代诚信.....242

6.6 建立诚信机制的效益分析.....247

6.7 加强市场经济诚信建设.....252

第七章 “天人合一”：儒家对环境问题的价值取向.....261

7.1 当代环境的问题和症结.....261

7.2 “天人合一”：环境伦理的基本理念.....267

7.3 “民胞物与”：“生活实践”的深层态度.....273

7.4 “自强不息”与“厚德载物”：“人在自然”的实践精神	279
7.5 “和合意识”：“尽善尽美”的生态理想	283
第八章 儒家伦理与现代企业经营管理	287
8.1 “内圣外王”：企业与企业家的成功之道	287
8.2 “兼善天下”：企业基本的经营理念	292
8.3 “和而不同”：企业经营与管理的基本方式	297
8.4 “为政以德”：企业管理的根本手段	302
第九章 文本与解读：儒家伦理精神与现代人智慧	309
9.1 儒家文本的基本定性	309
9.2 儒家智慧与现代人困境	316
9.3 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的定位	323
9.4 儒家伦理走向世界之路	329
后 记	333

第一章 导言：全球化背景下的儒家伦理

在我国传统伦理中，儒家伦理一直占据主导地位，长期以来对我国社会的发展、民族的繁衍和文化的延续起着主要作用。但是，自进入近代以来，儒家传统伦理逐渐褪去其光环，从明代中叶开始直至明末清初，它受到了来自本阵营内部的质疑、批判和挑战。1840年的鸦片战争，使儒家伦理在中国社会的主导地位彻底动摇。自此，儒家伦理在当代社会的定位问题成了中华民族忧虑的焦点，这种忧虑是由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本土与外国之间的张力引起的。这种张力归结起来就是“启蒙”与“救亡”的对立和矛盾：要想现代化或西方化，必须进行思想启蒙，即以近代资本主义以来的西方思想对国人进行启蒙，以便确立实现现代化的思想基础；而另一方面，中国的现实又饱受着西方列强的欺侮和蹂躏，这使得中国人不仅在感情上难以全盘接受西方文化，而且事实上有着自己的实践任务和价值目标，即摆脱西方的控制和欺侮，增强自己的综合实力，以一个具有自己文化特色和民族精神的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这就是说，要解决儒家传统伦理的现代定位问题，必须具有全球性视野，即必须把儒家传统伦理放到世界体系中去审视，这样才能发现其问题之所在，才能真正明白它所遭遇的挑战，也有可能找到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出路。

1.1 全球化的实质及其伦理意义

全球化是当前使用频率很高的概念。所谓全球化，一般是指经济、文化等在世界范围内的一体化。经济全球化与文化的全球化是一种互为表里的关系：经济全球化为文化的全球扩张开辟道路，而文化的扩张又使经济的全球化得到价值观的支持。经济全球化的基本含义是：在全世界范围内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形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链，从而在各区域、各民族国家之间形成分工协作关系，以便在全世界范围内更有效的利用资源、劳动、信息，使全球经济更有效率。但是，经济活动任何时候都不是纯粹经济领域的事，它不仅要向文化领域辐射，而且本身就承载着某种文化、承担着某种文化功能。因此，经济全球化和文化的全球扩张其实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其中最核心的方面是经济的全球化。

尽管“经济全球化”这个概念是最近才被人们耳熟能详的，但经济全球化作为一个过程，其实早在资本主义开始对外扩张时就迈出了第一步，迄今已经走了几百年了。这就是说，经济全球化基本上是和资本主义同时起步的，或者说，资本一诞生，就包含有向全球扩张的基因，这种扩张大体上可分为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表现为争夺殖民地和商品输出，到本国之外寻找商品市场，以便获取超额利润。第二阶段主要是资本输出，在外寻找廉价的原材料和劳务市场，使资本得以最大限度的增值。第三阶段主要是管理、制度和文化的输出，其目的一方面是为资本在非市场经济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扩张扫清意识形态、体制和文化障碍，另一方面是想将各国的经济、文化和制度都纳入资本的运作体系，服从资本运作的规律。我们目前所说的经济全球化，就是资本

扩张的第三个阶段。

这就是说，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扩张的本性相联系的。早在一百多年前，马克思就曾经预言，资本将向全球扩张，并终究会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共产党宣言》指出：“不断扩大产品销路的需要，驱使资产阶级奔走于全球各地。它必须到处落户，到处创业，到处建立联系。”在指出资本战胜地产是历史发展的客观必然趋势，并指出“资本是私有财产的完成了的客观形式”之后，马克思说：“我们看到，只有这时私有财产才能完成它对人的统治，并以最普遍的形式成为世界历史的力量。”

但是，资本为什么要进行扩张？在经济学意义上，资本扩张是为了获得更多的利润以便增强资本的竞争力。但在这一现象的背后，隐藏着更为深刻的历史逻辑。人类经历以市场为枢纽、以资本为纽带的市场经济阶段，对人类自身具有特殊的意义，它标志着人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所谓“新”是指人的发展方式之新。在前市场经济阶段，人的发展主要基于“人对人的依赖”这一平台。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人得以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等，都蕴涵在人与人的关系之中。人只有直接与人打交道、发生直接的联系和交往，才能使自身得到发展。例如，他可能依靠出身、门第、血统等人际因素获取发展的机会，也可能通过投靠、寻求庇护等手段来保护和发展自己。从某种意义上说，一个人价值实现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利用和驾驭人际关系的技巧。

但是，在市场经济阶段，由于资本代替血缘关系成了人与人之间联系的纽带，因而原有的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被瓦解了，人变成了孤立的个体，只有在市场上通过交换才能使人与人之间

《马克思恩格斯》第1卷，人民出版社，第254页。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第116页。

发生联系。个体的独立性产生了，而这种独立性是以对物的依赖为基础的，于是，人的价值的实现，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只有以物为中介才有可能。作为这种现象的逻辑结果，对人的价值的评价也主要是以物为尺度和标准。此时，人的价值的实现和评价出现了以下特征：

第一，人的价值的物化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主要指人的效用价值，即人在市场活动中使自己的内在本质效用化或物化，创造出具有某种实用价值的物品。人们通过该物品价值的大小来衡量行为者的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即使你拥有丰富的知识和学问，但如果不能使之实用化或物化，那你的价值是得不到应有的评价的。

第二，人的价值的交换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的价值是通过市场交换得到体现的。一方面，市场通过人所提供的生产要素（智力、技术、信息、管理、资本等）的经济效益确认人的价值，另一方面，人通过所提供的生产要素在市场中确认自己的价值（获取收益或实现自己的某种精神追求、价值理念）。从这个意义上说，凡不能提供生产要素的人，就意味着没有进入市场的资格，也就无法在市场交换中确认自己的价值。

第三，人的价值实现的竞争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是人实现其价值的主要途径。而市场竞争是经济活动的主要方式，因此人的价值的实现也必须在市场竞争中进行。在市场竞争中实现价值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通过市场竞争确立自己的市场地位，同时也就是确证自己的价值；其二，不同的个体因为其被市场认可的能力及实际市场效益不同而使价值的实现产生分化。一个拥有高新技术的人比一个普通的体力劳动者更能实现其价值；一个勤奋工作、锐意进取、高度敬业的人比一个得过且过、马马乎乎的人也更能实现其价值。

这说明，人只有以市场为舞台，以资本为依托，才能谋求自己的生存与发展，而人的发展包含了人的物质生活条件、人的生产技能以及人的精神品质和精神意义世界的全面发展。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不仅具有物的代表意义，而且也具有了人格、品质和精神价值的象征意义。由此看来，资本的扩张不仅仅是人求生存和发展的需要，而更重要的是表现自身的生命活动、确证自身价值的需要。作为前者，这种扩张主要表现为经济活动中追求利润的行为；作为后者，则主要表现为经营理念、管理哲学、企业文化、市场规则等精神与文化行为。因此，资本扩张是经济实力与文化、精神实力的同步扩张。一大批既有经济实力又有成熟的企业文化的跨国公司的出现，就是这种扩张的直接结果。而一些世界性组织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的出现，以及互联网的大量应用与迅速普及，既是资本扩张的产物，同时又由于它们将全球经济联成一个体系而进一步促进了这种扩张。于是，经济全球化就成了一种挡不住的潮流。

这样，经济全球化就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全球化的过程就是由经济扩张或资本扩张到文化扩张的过程。因此，西方价值观（西方国家基本上都是经济强势国家）的普世化是经济全球化的基本目的；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是经济扩张的一种特殊形式（资本扩张的第三阶段），因而其文化扩张表现得特别明显，而这种文化扩张又隐藏着西方人财富增值的欲望。因此，我们可以把这种关系概括为：经济扩张到一定的阶段，必然要产生文化扩张的要求；文化扩张又为经济扩张开辟道路。经济全球化所内含的这双重意义，是我们今天不得不察的。

那么，我们如何评价经济全球化的伦理意义？有人说经济全

在当代社会，资本已不仅仅表现为货币形态，凡是可以作为生产要素使用并能产生效益的东西如知识、技术、才能等，均可以称为资本。

球化将是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胜利；有人认为，经济全球化是自由主义发展的顶点，其后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即达到对自由主义的否定，其结果会是共产主义的辉煌。笔者认为，无论是哪一种结果，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场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是由资本主义国家发起并主导的。这一判断意味着，在经济全球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是主角，而且无论是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是主角。如果这一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同时也是文化整合的过程，其整合标准是资本主义的文化理念和价值观念；其目的是要在全球推行含有资本主义精神的文化。概言之，这场文化整合运动，是以主流资本主义文化去挤压、消解别的国家和民族的文化，以达到他们所认可的文化一致性的文化改造运动。由于主流资本主义在经济上居于强势，因而这种文化整合带有明显的文化强权和话语霸权的特征。

不过，这里有必要对“文化整合”这一概念做进一步分析。人们现在对这一概念有两种基本的理解：一是指以主流资本主义国家的核心价值观为参照系，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价值观和文化理念进行整合，使其他民族的价值观与主流资本主义的价值观相一致。二是指各民族文化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相互碰撞、相互吸收，最后达到相互融合。如有的学者认为：“所谓文化整合，是指不同价值观念、生活方式之间的发展与协调。”笔者是在前一种意义上使用“文化整合”这一概念的。关于后一种意义，笔者不认为是一种文化整合，而只能被称为某种程度的文化融合。

目前关于“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提法已成时尚，但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并不是我们所认为的文化整合。关于对这一概念的理解，笔者同意这样的看法：寻求普世伦理不是排斥或否认不同民族文化传统的伦理价值，而是应在尊重各民族文化传统的

扈海鹏：《全球化与文化整合》，《哲学研究》，2000年第1期。

伦理价值的基础上发展和利用不同民族文化传统中的伦理思想的内在资源。因而所谓“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是建立在人类社会之公共理性基础上的普遍伦理”，是“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是“人们可以在一定条件下共同认可和践履的公度性道德”。这就是说，所谓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并不是说人类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的伦理准则达到“人类大同”，而是说在一些底线伦理要求上，由于人类具有某些共同利益和需要，因而可以遵守某些含有共同利益、带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准则，如生态问题、环境问题、合理利用自然资源问题、人际交往的共同秩序问题等。而作为每个民族特性之表征的文化传统和一个民族的核心价值观，是不能纳入全球伦理或普世伦理的。

这就是说，经济全球化的伦理意义具有两方面的属性：一方面，由于经济运作规则和经济活动方式的趋同性，使得全人类具有某些共同的精神需求和利益期待，这将促使人类认同某些具有普遍意义的伦理准则，因而使得全球伦理在某种程度上和某些方面成为可能。而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全球化是强势经济挟带着强势文化的全球化，因此它可能造成的后果是强势文化即资本主义文化消解和排斥其他民族文化的局面，因此经济全球化可能既造成经济霸权，又造成文化霸权。

1.2 儒家伦理在全球化潮流中的命运

经济全球化同时也是文化的全球化，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正如我们在前面所分析的，这两种意义的全球化其实都是资本主义化。西方有些人如福山等人拼命鼓吹“历史终结论”，就是在为资本主义文化的全球化张目。其实这也并不是什么新鲜东西，马克

思早在批评古典经济学家时就指出：“经济学家们在论断中采用的方式是非常奇怪的。他们认为只有两种制度：一种是人为的，一种是天然的。封建制度是人为的，资产阶级制度是天然的。在这方面，经济学家很像那些把宗教也分为两类的神学家。一切异教都是人们臆造的，而他们自己的教则是神的启示。——于是，以前是有历史的，现在再也没有历史了。”这种“历史终结论”是资本主义一个解不开的情结。如果说，在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由于工人运动的风起云涌，更由于共产主义运动如火如荼，资产阶级所谓“历史终结论”还有些遮遮掩掩、底气不足的话，那么，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越来越汹涌，更由于国际共运陷入低谷，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和各社会主义国家纷纷进行改革，使得资本主义的这种“历史终结论”更加理直气壮。在他们眼里，一切文明、体制和观念都不具有合理性，只有资本主义的文明、体制和观念才是天然合理的。亨廷顿所谓“文明冲突论”恰好反映了他对其他文明的存在以及对他所认为的“正统文明”的威胁耿耿于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只是从另一个侧面表现了他对资本主义在全球胜利的自信以及他对其他文明的漠视态度。那么，在这样的世界格局下，其他文明怎么办？具有几千历史的中华文明怎么办？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这样的问题很自然就会成为关注的焦点。

文明和文化是两个相互联系又很难严格区分它们界限的概念。学术界对这两个概念的含义和区别颇多争议，梁漱溟先生认为：“文化与文明有别。所谓文明是我们在生活中的成绩品——譬如中国所制造的器皿和中国的政治制度等都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生活中呆实的制作品算是文明，生活上抽象的样法是文化。不过文化与文明也可以说是一个东西的两方面，如一种政治制度亦可说是一民族的制作品——文明，亦可以说一民族生活的样

法——文化。” 塞缪尔·亨廷顿认为：“文明和文化都涉及一个民族全面的生活方式，文明是放大的文化。它们都包含‘价值、规则、体制和在一个既定社会中历代人赋予了头等重要性的思维模式。’” 尽管这两种说法不尽相同，但也有共同点。亨廷顿所说的“价值、规则、体制和思维模式”其实与梁漱溟先生所说的“民族生活的样法”很接近，都主要是指精神层面的东西。这样，当我们探讨中华文明的出路时，我们实际上是要探讨这种文明的“抽象的样法”——文化中的精神特质——的出路。一种文化主要有三个组成部分：器物、制度和精神。在这三个部分中，精神起着重要作用。如果说，器物是民族生活的成果，制度是民族生活的范式，那么，精神则是民族生活的灵魂。因此，文化作为一个民族生活的“抽象的样法”，主要是就精神而言的。在一个民族的精神中，伦理精神是其主要成分，它不仅规定了人们的精神生活的样式和目标，而且还制约着制度的设计与安排，甚至还把其价值追求融入物质产品即器物之中，让器物体现出某种民族精神。所以，探讨一种文化的命运与出路，核心的问题在于探讨这种文化中所包含的伦理精神的命运与出路。

在中华民族的伦理生活中，儒家伦理一直占主导地位，儒家伦理中所包含的精神成了中华民族的主导精神。在这种精神引导下，中华民族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历史，对人类做出了重要贡献。但是，自鸦片战争以来，儒家伦理遇到了严重挑战。国人从中国由于落后、羸弱而被外国列强欺凌的现实中，痛切地感到，强大的国力是以强大的文化为支撑的，因而要想国力强大起来，必须使自己

梁漱溟：《东西文化及其哲学》，载《儒学复兴之路——梁漱溟文选》，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第39页。

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24～25页。

的文化首先强大起来。尽管在如何使我国文化强大问题上看法不一，但有一点基本法已形成共识，那就是，传统的儒家学说必须改造和转型。

这样，我国传统伦理的现代转型问题被提上议事日程，已经有一百多年了。客观地说，这一问题不仅没有得到真正解决，而且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显得尤为突出。当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挟带着文化整合的企图席卷而来的时候，我们不仅感受到了经济实力方面的劣势，而且又一次深切感受到经济强势国家的文化压力以及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挤压。与一百多年前类似的问题又一次严峻地摆在了我们面前：在世界体系中，中国文化究竟有没有自己的位置？如果有，中国的传统文化究竟以何种方式融入现代潮流？从这一意义上说，我国传统文化——主要是儒家伦理——在当代的命运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探讨儒家伦理在经济全球化局面下的命运，实际上是要探讨和说明这样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的局面下，儒家伦理所面临的困境究竟是什么？儒家伦理有没有生存的空间和理由？儒家伦理走出困境的根本途径是什么？

那就是说，要分析和说明这些问题，都离不开经济全球化这个大背景。我们在分析经济全球化的伦理意义时已经指出，经济全球化含有很强的文化整合意味，它实际上是经济强势国家借助经济力量和经济运行规则推行其核心价值观的过程。这样，在经济全球化的潮流面前，儒家伦理就成了被资本主义强势文化挤压和消解的对象，这是儒家文化所遇到的直接困境。如果不能顺利走出这一困境，儒家文化就很有可能沦为边缘文化，甚至被消解掉。早在1896年，康有为的“公车上书”就说：“古之灭国以兵，人皆知之；今之灭国以商，人皆忽之。以兵灭人，国亡而民犹存；以商贾灭人，民亡而国随之。”这实乃振聋发聩之语，在今天仍然具有警示意义。所谓以商灭人，实际上乃是以文化灭人。因为商品总

是含有某种文化意蕴的，当人们在消费可口可乐、麦当劳的同时，也在消费其中的文化，侵染着某种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就在这种消费中不知不觉地接受了某种文化理念。一个已丧失了本民族文化特质和核心价值观的民族，还能以什么作为自己的标识？此时，国虽未亡，但由于民已非吾民而国实亡。

儒家伦理文化在康有为时代所遇到的困境，在今天仍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这是很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笔者认为原因大致有以下几点：

第一，儒家伦理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前市场经济文化或称古典文化，它未能产生出市场经济精神和价值观念。当它面对孕育出强大物质文明的资本主义精神时，使人感觉到如昨日黄花，它自身并没有抵御这种新兴精神文明的能力。

第二，当中国的国门被强势国家打开之后，儒家伦理成为首当其冲的冲击对象。它不仅受到外国强势文化的冲击，而且遭到本国国民的谴责和批判。“打倒孔家店”的声音不绝于耳，人们认为中国的真正希望就在于彻底抛弃儒家学说。陈独秀认为：“万一欲建设新国家新社会，则对于此新国家新社会不可相容之孔教，不可不有彻底之觉悟，勇猛之决心，否则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在这种理念支配下，引进和模仿西方的价值观成为一种潮流，而儒家文化则成了无处依附的游魂，批判和改造传统的任务被搁置起来。尽管新儒家自觉地承担了这一任务，但主要还是在学理的层面上进行，其影响主要限于学术界，没能真正对社会产生影响，因而也没能改变儒家学说游魂的处境。

第三，中国进入近代以来，几乎一直是在向西方学习，学技术、学体制、学价值观。后来以俄为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

想，以社会主义作为基本的国家制度。其实也还是在向国外学习，只不过换了一种价值体系。这种学习隐藏着中国人内心深处要求国家迅速强大起来的紧张和焦虑，因而就使得我们几乎没有时间和精力来反思我们自己的文化和精神传统。直到今天，我们仍然满足于引进、模仿国外的东西，只不过这一回是完全的一边倒——在“向国际惯例靠拢”的口号下，我们清一色地学习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又一次把传统置于脑后。

第四，儒家伦理文化毕竟有着几千年的历史，是不可能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消失得无影无踪的。在民间、在非政府领域，儒家思想仍在顽强地表现自己。但这种儒家思想基本上还是原汁原味、未加任何改造的东西，它对现实所起的副作用使人们对儒家思想产生了更深的误解。这种误解对儒家思想的改造和转型是十分不利的。

以上是儒家伦理文化至今仍处于困境的基本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外部因素，二是内部因素。外部因素是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后盾的强势文化的冲击和挤压；内部因素则是指我们自己没有认真对待文化传统。在这两方面因素中，内部因素是起决定作用的方面。综观世界上有所作为和成就的国家与民族，无不认真对待自己的传统：既不割断与传统的联系，又能通过对传统的反思和批判超越传统，从而在传统中获得新生。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就不会有现代资本主义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些国家和民族对传统的态度给我们的启示是：从社会现实要求出发来审视、反思、批判和改造传统，不仅让传统融入社会现实之中，而且在传统中标示未来，即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三维中寻找最佳的契合点。而我们对待儒家传统则往往采取极端的态度，要么敝帚自珍，要么弃之不顾，近代以来尤其如此。因此，到鸦片战争时，中国既有的文化传统就已经毫无生气、虚弱不堪了。即使没有外来文化的冲击，儒家传统